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THE LURE OF THE MODERN

现代的诱惑

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

现代主义 (1917—1937)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美〕史书美 著

何恬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 东 主编



THE LURE OF THE MODERN

现代的诱惑

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

现代主义 (1917—1937)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美」史书美 著

何 恬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美]史书美著;
何恬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2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4532-4

I. 现... II. ①史... ②何...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1917—1937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5309 号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 - 1937
Copyright © 2001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 2007 by JSPP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3-084

书 名 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
著 者 [美]史书美
译 者 何 恬
责任编辑 张蕴如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5.25 插页 2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532-4
定 价 3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序

1990年秋季,我拜访了已经85岁高龄的施蛰存先生。在30年代的现代主义者中,他是唯一健在的一位。他的寓所位于上海市中心一座民国时代修建的老房子内,而在房子坐落的那条狭窄的林荫道上,还拥挤地排列着许多类似的建筑。这套公寓有三个房间。在主要的房间里,我看到了一些老上海的遗迹:天花板边缘的线脚、壁炉,还有带有铁护栏的小阳台。过去几十年里,由于被马克思主义式的民族主义和禁欲主义意识形态所控制,这个国家到处充斥着实用主义风格的建筑,因而,施老寓所中的这些老上海遗迹在其中也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若是壁炉仍然可以使用,或是阳台上摆满了盆栽植物,人们或许还会以为,时光被凝固在了上世纪的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彼时,欧化的生活方式在上海的世界主义文化精英那里构成了一股流行潮流。但是如今,壁炉是空的,也没有必要的工具。在“大跃进”的年代,这些铁制的生火工具已被拿去炼钢而从此一去不返。与壁炉的命运相似,现在的阳台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个房间是施老的书房、卧室、餐厅兼起居室,虽略显拥挤但却整齐舒适。施老端坐在屋子中央的书桌旁,抽着烟斗,白衬衣的外面套了一件绿色的绒浴衣,灰黑色的裤子,一根老式的皮带紧系腰间。一耳带有助听器的施老,长着一张椭圆形的面庞,亲切而优雅。这些特征都与他的南方绅士身份极为相称。整整三天,他谦和地回答着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包括他的工作和他在旧上海当作家的青年时代。他不仅动情地谈起了自己最钟

爱的作家（包括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美国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等西方作家），而且还谈起了如“解构主义”这样的文学理论领域的最新发展。

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他对青年时代的回忆，那时的施老是一个年轻而有抱负的作家和编辑。同时，尤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施老的消息灵通及其言谈的“当代”性。我们在历史、地理、性别以及年龄等方面的差距似乎一下子消失了，他对中国现代史巨变的参与也成了可以绕过去的经历，好像这一切都能被轻易地回避和遗忘。许多文化批评家都已注意到民国时代和20世纪80年代的相似之处，他们指出80年代是一个追求文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新”启蒙时代。在这个新启蒙时代，曾经的重要作家和编辑施蛰存必然地“复生”了，成为了一位重要的现代作家。他的重要著作均被再版。人们可以在书店找到全套由他编辑的《现代》(*Les Contemporaines*)杂志。可以这样说，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股对民国时期文学的怀旧浪潮，在此浪潮中，不同类型的年轻作家们都从前辈身上找到了某种认同，同时也获得了从事更加明确的跨国文化写作所需要的灵感。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思潮来说，这类文化写作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股思潮的格言就是“走向世界”^①，这一新词在90年代被转变为“走向全球”。从历史角度看，这种怀旧绝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从1949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在整个的文学史上，所谓的世界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作家都被视作为西化的，也即思想意识落后和精神颓废的群体而被排斥和忽略。在文化热时期，这一局面被扭转，一批现代主义作家的地位被恢复，进而成为了人们热心学习的榜样。当然，我采访施蛰存的1990年秋天已经是这股文化热的尾声。

20世纪80年代的民国怀旧热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仍是一个极端

① 关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见王瑾：《高度的文化热：邓小平中国的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High Cultural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年；张旭东：《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现代主义》(*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年。

奇特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怀旧行为的对象是半殖民主义的文化产品,其政治、社会和文化构成都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目标所排斥。颇具讥讽意味的是,我们可以说,对过往的怀念是一种殖民怀旧,这不是殖民者的怀旧,而是被殖民者的怀旧。这也许是一个只会发生在中国的特殊文化现象,因为此前的中国恰处于文化隔绝状态和固定不变的意识形态之中。文化热的拥护者们热衷于对政府进行批评。他们将这一带有殖民意味的怀旧行为当作了一种针对党和政府的反对性话语(counter discourse),进而利用这一话语隐晦地表达出了他们的批评。在表现对半殖民地上海的怀旧情结方面,王安忆广获好评的小说《长恨歌》(1995年)无疑是最好的例子。这一小说充满了对资产阶级的情感和生活方式的颂扬以及对建国后那段岁月的明确否定。20世纪90年代,80年代的文化狂热被否定,但随即就出现了一股试图恢复市场经济制度和民国生活方式的广泛热情。进入90年代,民国日历、民国海报等大量民国遗物的出现标志着一股复古潮流的形成。在这股复古潮流中,对具有半殖民意味的文化产品的怀旧行为被商品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了80年代的文化热在90年代之文化商品化浪潮中的延续。在经过一度的压制之后,文化商品化潮流代替了具有高度严肃性的文化热。

就中国现代性的时间性和空间性问题来说,怀旧行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民国时代的文化被重新认定为“现代的”,那么1949—1976年的文学显然就属于另一个类别,而与民国相连的20世纪80年代则在某种意义上神奇地跃过了前面这一时段。这就好像在说,作为一种总是沿着西方化路线被定义的模式,中国的现代性只能短促地爆发,而缺乏一种历史的延续性;换句话说,这似乎是说,无论是对于原始资本主义来说,还是对于半殖民性质的资本主义来说,亦或是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来说,中国的现代性总是无可避免地成为某种资本主义形式的副产品。由此,民国时代的启蒙话语,穿越了时空的距离在新启蒙的时代获得了延续,它重复着中国现代性和文学现代主义的主题,虽然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我们设想一下,假

如早期的启蒙运动在殖民地自治的范围内一直延续而没有被中断，那么，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又将会以何种不同的姿态被提出和探讨呢？如果中国现代性是一般意义上的作为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副产品的第三世界现代性的象征，那么，对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局限性以及可能性的不断探讨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不同的有关第三世界现代性形成过程的叙述啊。当然，这一叙述具体如何，这一叙述又将如何发展，我们已然无从知晓。我的意思并不是想说半殖民主义应该继续存在，而是想发问，如果历史不曾猛然断裂，中国人应该能够构想出一种不同于今日现代性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也应该不至于会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发生如此急速的结合。如果是这样，恐怕也就不会出现 90 年代新左派知识分子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所作出的那种焦虑而又无望的抵抗了。

一个对民国时代的半殖民现代主义进行理论化研究的学者，又是如何参与进 80 年代和 90 年代中国的这场怀旧浪潮的呢？虽然，作为种族上的而非国籍上的中国人，我可以拒绝参与中国的集体怀旧，但是，在过去的十年中，半殖民地的上海已经成为了美国学者所思考的重要怀旧思潮的场所，众多会议和大量书籍都围绕着这一话题展开，上海的现代主义已经成为了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一个时髦话题。在一次有关上海的会议上，我曾经问了一个颇具自我指涉性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如此钟情于研究旧上海。我得到了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回应。如果说在中国学者和中国的集体怀旧之间存在着某种共谋的话，那么，这些怀旧行为的性质也必然是各不相同的，因为这受到了各人不同的主观立场的感染。由于出生在国外，且接触过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台湾的现代主义，我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被多样的殖民主义经验所影响，且更具自省色彩：中国台湾的现代主义是如何被国民党的疯狂反共行为所支持，且使得西方文化的魅力得以加强，西方的现代主义得到承认；在战后韩国疯狂的现代化浪潮中的成长经历，使我可以不假思索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文化表述；而我获得的英美文学学位则对我的这项中国现代主义研究提供了知识准备。各种人文学

系在审查其来自东亚的申请者之时,都会考察申请者在英美文学方面的背景,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不仅对语法要精通,而且申请者的概念框架还要能够和美国的概念框架相互包容。在世界主义或者学术规范的名义下,我们每天都会被新的殖民的文化支配所训练,并且对之作出微妙的服从。

当然,正如从绝对的殖民框架出发来研究民国的中国现代性的做法是不公正的那样,把主体构成的复杂过程仅仅归结于新殖民的影响的做法也实在太简单。正如我不会把自己的主观构成简化为对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被动服从过程,我同样也不会如此地思考和描述诸如施蛰存这样的中国现代主义者。多年来,我对施蛰存及其他穿越“地区/全球”(local/global)划分的民国现代主义者的历史、政治、文化之迫切需要的思考,一直在激发和鼓励着本书的写作。

当着手这一课题时,我并未预想到,中国现代主义的历史、文本及理论基础将会获得如此广阔的呈现。这一基础首先包括了现代主义者叙述中的地区偶然性和迫切需要,因此,我将半殖民主义理论化为一种不同于正式殖民主义的社会形式。第二,它包括了中国现代主义和其他现代主义之间的联系(尤其是西方和日本),而中国现代主义的跨国性是通过话语和政治权力等多个领域被表达出来的。这些就是我对中国现代主义的地区和全球语境的表述,而这种地区与全球的相互影响将直接关系到意义结构和主体性结构的不断变化。从我个人的话语偏好出发,这一基础更包括了对第三世界现代主义理论、殖民主义和后殖民性,以及地区/全球文化研究等等的比较研究。

这本书作为以上思考的结果,我想把它提供给以下一系列的读者。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领域的学者而言,本书结合文本、历史与理论的探索,提供了对从1917年的“五四”时期开始,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结束的一段时期内的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解释;对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家来说,本书勾画出了中国、日本与西方的现代主义的交叠之处,并且从多重殖民轨道和文化相遇中追溯了这种跨国路线的形成,进而解构了比较文化研究中所习惯预设的中心/边缘、东方/

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对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来说，本书从理论上探讨了中国的半殖民主义是如何表现出一套不同于正式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与实践的。在我看来，处于地区与全球相互影响中的中国现代主义同时被这两条轴线所定义，而不论这两轴之间实际存在着多么大的不同。对我来说，地区和全球之间的同步性和历史关联，勾画出了一个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的“中国人的主动性”的运作轨迹和表述。

这些不同的分析方向也要求我提供出一个能够整合历史、文本和理论的方法论。在实际运作中，这三个方面是交叉进行的，我们几乎不可能描述出何处是一方面的结束，何处又是另一方面的开始。我以方法论的综合来审慎地反对各种方法论的区分，这些区分包括历史研究中传统的“经验的”和“理论的”之分，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的”和“文本之外的”之分，跨文化研究中的“西方理论”和“非西方文本”之分。本书可分为三个部分——分别谈及“五四”时期、京派和上海的新感觉派。全书起始是一个介绍性的章节，我将叙述我对中国现代主义进行讨论所依靠的理论和历史依据。书中每一部分的开始都是一个起始性的章节，我将努力对那一时代的文化思潮进行理论化。在这些章节中，我们将看到，各种对现代性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定义最终导致了以不同美学形式出现的多种现代主义。除了起始性章节，每部分的其他章节都将围绕具体的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展开，我将对他们在探讨文化现代性时所采用的特定表达方式进行分析。

最后，我们来谈谈本书题目——“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中的一个词。在“诱惑”一词中，我暗示了服从和否定的双重过程。中国的现代主义者将现代性视为充满诱惑的、迷人的、值得想望的东西，他们或自觉或不自觉地臣服于这一外来的范畴。这一臣服可以被说成是催生了中国的世界主义者。但从不同的意义上看来，中国的现代主义者们又积极地渴望和呼唤着现代性，在黑格尔哲学的否定过程中将现代性转化为内在固有的范畴，在地区范围内修订、再定义、再创造现代性。于是，主体性也同样被催生

了。对于现代中国的半殖民主体形式来说,服从和否定之双重过程的相互纠缠是颇具地方性的。就诞生于地区/全球大背景下的现代主义创作来说,无论是出自服从的中国作家之手,还是出自主体性极强的中国作家之手,有关文化殖民和文化主动性的二元对立假设都已被不可避免地瓦解了。

和其他学术成果一样,本书的研究无可避免地受惠于笔者众多的朋友、同事、领导、学生和家人。我要感谢哈佛大学的李瓿梵和北京大学的严家炎,他们不断地指导和帮助着我。我要感谢 Steven Day、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王德威和叶文心,他们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手稿。我要感谢 Stanley Abe、Michael Bourdaghs、德里克(Arif Drilik)、贺潇(Gail Hershatter)、黄亦兵、胡志德(Ted Hutters)、利大英(Gregory Lee)、Seiji Lippit、刘禾、孟悦、Leslie Pincus、罗丽莎(Lisa Rofel)、苏源熙(Haun Saussy)、Miriam Silverberg、王超华,他们阅读了本书的部分章节。我要感谢我的教父陈祖文和香港诗人梁秉钧,他们最早鼓励了我。我要感谢加州大学人文研究学院“东亚的殖民主义和现代性”小组的成员(有阪阳子[Yoko Arisaka]、崔贞茂[Chungmoo Choi]、Tak Fujitani、James Fujii、白瑞梅[Amie Parry]、Lisa Yoneyama,还有我已经感谢过的胡志德、贺潇和罗丽莎),他们充当了我研究的合作者和对话者,并对我的研究提出了批评。同样地,我也要感谢在多次会议中,与我一起参与批评对话的跨文化研究网的成员们(陈清侨、张颂圣、李湛忞、李瓿梵、Steven Lewis、廖炳惠、刘禾、Richard Smith、汪晖、王瑾和查建英)。我要感谢洛杉矶的 Jean Hamilton、Katherine King、凌津奇、李欧娜(Francoise Lionnet)、Robert Buswell、Don Nakanishi、Herman Ooms 和其他在学术和情感上给过我支持的朋友。此外,还要感谢我的研究助手 Eileen Cheng、黄亦兵、Kelly Jeong、James Lee 和 Mary Wang。最后,我要感谢 Fulbright-Hays 基金会资助了我在中国的调查研究,我也要感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给予的博士后研究基金,感谢 UCLA 的职业发展奖金和年度学术评议奖的赞助。UCLA 的中国研究中心支付了编索引的费用。我感谢我在东亚

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系、美国亚洲研究所的同事们，感谢他们的帮助和友情。

我的家庭应该值得我用单独的一段来表达我对他们的谢意。我的丈夫雅堂，我的儿子小田和小睿，我的父亲史守溥（1935—1994）和母亲张桂兰，我亲爱的姐妹们（书翠、书嫵、书香、书慧、书萍）。他们不得不忍受我从与他们相处的时间中不断抽出时间来进行这项无休止的工作。为此，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目 录

序 / 1

导论：中国现代主义的全球性视角和地区性视角 / 1

第一部分 渴望现代：“五四”的西方主义和日本主义 / 55

第一章 时间、现代主义和文化权力：地区性的结构 / 57

第二章 进化论与实验主义：鲁迅和陶晶孙 / 83

第三章 精神分析与世界主义：郭沫若的作品 / 108

第四章 利比多与民族国家：郁达夫、滕固等的道德颓废 / 124

第五章 他恋 (loving the other)：全球语境下的“五四”西方主义 / 145

第二部分 重思现代：京派 / 169

第六章 未曾断裂的现代性：对新全球文化的建议 / 171

第七章 用毛笔书写英文：废名的著作 / 214

第八章 地区语境下的性别协商：林徽因与凌叔华 / 229

第三部分 炫耀现代：上海新感觉主义 / 259

第九章 现代主义与大都会上海 / 261

第十章 性别、种族和半殖民地性：刘呐鸥的上海大都会风景 / 311

第十一章 表演半殖民的主体性：穆时英的著作 / 341

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与内在性：施蛰存的“色情-怪诞”小说 / 384

结论：半殖民地性与文化 / 420

附：后来的现代主义——战争岁月及其后 / 428

参考书目 / 435

导论：中国现代主义的全球性视角和地区性视角

形式分析必须牢固地建立在历史形态分析的基础上。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89年)

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声……在帝国主义阶段……吉普林在自己的诗歌中赞颂英帝国主义，意大利未来派作家则是法西斯主义的雇佣诗人。

——胡秋原(1931年)

假设一个存在物本身不是一个对象，也没有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存在物首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它之外别无他物，它是孤独的。一旦在我之外有了其他的对象，一旦我不再孤独，我也就成了他者，即除了外在于我的世界之外的另一个现实。由此，对于这第三个对象来说，我即是另一现实，换句话说，我是它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假设一个存在不是另一个存在的对象，就等于预先假定世界上并没有客观存在。一旦我有了一个对象，那么我也就成了这个对象的对象。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1844年)

如果我们要恢复区域研究的传统，我们就必须意识到地区性本身即是一个历史的产物，而突显出地区性的历史最终又将服从于全球性的动力机制。

——阿尔让·阿帕都莱(Arjun Appadurai, 1996年)

用西方的批评术语来分析非西方著作的做法极为轻捷地动摇了文化话语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范式。这尤其体现在我们对“现代主义”这一术语的使用之中。学术界对此术语的关注已长达数十年,而这一术语也已经在西方文化价值体系中占据了某种支配性的地位。^① 尽管西方话语将“现代主义”运动构想为一场国际化运动,但是它却整体性地拒绝非白色人种的非西方人在其现代主义研究的万神殿中占有一席之地。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和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合编的《现代主义》一书是有关现代主义批评和现代主义历史的经典教科书,它为我们描绘了现代主义研究的知识地图。如果快速浏览一下这幅知识地图,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一个非白人的城市能够有幸出现在这幅地图中。^② 即便西方曾经宣告过现代主义运动具有国际性的特征,但地缘政治学意义上的文化与种族中心主义却鄙视非白人参与进这场运动。这些中心主义认可了欧美现代主义对边缘价值的遮蔽,并宣告了欧美的中心地位,由此,所有可能对现代主义之“中心-边缘”(center-periphery)观念构成挑战的证据都被简单地忽略了。例如,曾有研究者指出,用术语“现代主义”来指称一场美学运动的做法是对拉丁美洲现代主义(el modernismo)的一种挪用,而拉美现代主义则是由尼加拉瓜诗人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ío)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提出的。^③ 这一大都会(metropolitan)中心话语对边缘话语词汇进行挪用的事实^④突显出了某种明显松散的支

① 这里的“西方”除了用来指代欧洲和北美国家,我还将西方当成是一种象征性建构。我的这一思路延续了印度庶民研究小组对西方的定义。在他们看来,西方是“被一种历史进程创造出来的强大的想象性实体,而这一历史进程将西方权威化为理性、进步和现代性的故乡”。西方实际是一种由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推广和普及的想象性建构。见加恩·普拉卡什(Gyan Prakash):《作为后殖民批评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 as Postcolonial Criticism”),载《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第99期,1994年,第1475~1490页。

② 见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Malcolm Bradbury)、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编:《现代主义》(Modernism),New York: Penguin Books,1976年。

③ 见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现代性的五副面孔》(Five Faces of Modernity),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1987年,第69页。

④ 本书中的“metropolitan”主要是用来指代作为工业发达的地缘政治概念的西方。我也用它来区分下面两个概念: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在中国之外的都会西方和中国境内作为帝国主义存在的殖民西方。

配关系，暴露了将话语中心等同为文学起源的文学史盲点。无论是从西方描述现代主义的独断方式中，还是从非西方描述现代主义的方式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异常显著的话语支配关系。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会认识到非西方对现代主义的描述方式事实上只是西方描述方式的一个变种。换句话说，西方现代主义将自己建构成了所有“过时的”(belated)非西方现代主义的最终参考标准和框架，而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别仅仅只意味着某种“变化”(variations)。现代主义一直被描述为一个从西方向非西方(然而事实上却是现代主义的起源地)的移动过程。人们从未对大都会西方的源头地位提出过质疑。现代主义成了使西方获得凌驾于非西方之上的文化权力的动力来源，于是，学术界迫切需要一种立足于地缘政治层面的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来对此进行审视。现代主义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单向的旅行，这也就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话语层面的不平等。

近些年来，试图对富有殖民意味的都会现代主义概念提出挑战的努力已经出现，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修正行为，然而，学界还没有对现代主义叙述之单向性的基本特征提出过系统的质疑。最近对非西方现代主义所作出的种种理论阐释已经向人们表明，对于西方来说，现代主义乃是一个非均质的(heterogeneous)运动，而都市现代主义的理论化过程实际充斥着各种地域偏见、欧洲中心主义偏见和家长制的等级偏见。美国和美国以外的第三世界批评家业已证明非西方世界的现代主义不仅增补了而且挑战了都会现代主义。在都会西方中心内部，那些被现代主义长期视为他者的人们业已展开了一系列重建性的努力：女性主义者从女性批评和女性主义文学史的角度重写了现代主义的历史^①；少数族裔

^① 女性主义批评者试图把性别书写进现代主义。特别是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正致力于那些曾经被低估了的女性现代主义者的小说，以建立起一种反传统的女性现代主义。例如 Bonnie Kime Scott 编：《现代主义之性别》(The Gender of Modernis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0 年；苏珊·克拉克(Suzanne Clark)：《感伤的现代主义：女性作家与词汇革命》(Sentimental Modernism：Women Writers and the Revolution of the Word)，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 年。